

运河论坛

“走在前、勇争先”蹄疾步稳

本报评论员 刘太福

“走在前、勇争先”，是省委赋予济宁的重大使命。2025年，济宁坚定扛牢“走在前、勇争先”的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现代化强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是济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垒台、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年终岁尾，盘点一下一年来的有关工作，对于乘势而上、接续推进济宁“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市建设至关重要。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2025年，我市创新实施“链长制”，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232”优势产业集群，培育现代化工业体系，一批重大项目和战略项目相继落地建设、投产达效，工业经济逐季向好，为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大后劲。我们要清醒认识工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大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聚焦“232”优势产业集群，谋划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全力推动工业经济迈上万亿级、五个核心指标实现倍增，加快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市。

港航物流实现新跨越。2025年，我市立足运河“黄金水道”独特优势，抢抓内河航运发展机遇，以现代港航物流牵动发展，加快建设亿吨大港口、发展亿吨大物流、培育千亿大产业，探索构建“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育港”的发展新格局，现代港航物流蓬勃发展——5000吨级轮船、万吨级船队通达全国50多个港口，物流贸易覆盖国内152个城市及19个国家。济宁由河而兴、依河而建、因商而荣，历来有“运河之都”的美誉。我们要持续放大优势，加快打造“三个亿吨级港口群”“七大百亿临港园区”，创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全力打造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的开放大通道，服务山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北方内河航运中心。

文化“两创”成果丰硕。2025年，我市充分发挥文化底蕴深厚、资源富集优势，加快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打造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高地，持续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文化传承保护更加有力，文艺精品创作更加繁荣，文化普及转化成果丰硕，文明交流互鉴持续深化，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文化“两创”工作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济宁的独特优势。我们要坚定扛牢文化“两创”使命担当，充分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高水平承办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培育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持续擦亮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等品牌，让“文化中国行 欢迎到济宁”“文化济宁 礼迎天下”成为最亮丽的城市名片，加快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

“十四五”即将收官，“十五五”征程将启。展望未来，济宁必将以更大担当、更大作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扛牢“走在前、勇争先”使命担当，锚定加快迈向万亿城市“一个目标”，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济宁篇章。

锐评

安全生产是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黄翰铭

时值年终岁尾，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往往是安全生产事故多发高发期。对安全生产这个人命关天的问题须臾不可放松，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当前，2025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正在进行。22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今年的安全生产工作开展考核巡查。这是首次以中央名义开展的安全生产“年度大考”，力度大、措施硬、问责严。考核巡查坚持“多通报、多督促、多暗访、多拍摄影像”，通过加强问题隐患排查曝光，倒逼主体责任将安全要求落到实处，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彰显中央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安全促发展的坚定决心。

考核巡查是工作手段，消除隐患、整改提升、遏制事故再次发生是根本目标。记者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地方检查时发现，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亟待消除：部分渔船为多打鱼严重超载，远洋作业甚至不满足最低配员标准；消防技

能培训“走走过场”，日常设备巡查“做做样子”；安全出口长期锁闭，防火分区超过规范要求……种种隐患为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祸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绝非一时之功，不能搞“一阵风”。任何整改中的形式主义都无异于谋财害命，要坚决摒弃“被动式迎检”“应付式整改”的思想，切忌弄虚作假、敷衍了事。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防范遏制事故发生。

安全生产是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挑剔”，而在于“筑堤”。各地各部门应将此次考核巡查作为一面镜子，对考核巡查反馈的问题逐项整改、举一反三，从根本上消除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为稳定可靠的安全环境。

(12月12日新华社)

华峰漫画



前不久，一自媒体创作者拍摄的宫灯主题视频走红，全国各地的买家慕名而来，沉寂多年的北京市美术红灯厂积压了几十年的近千只库存很快被清空。北京宫灯破圈爆火，照见的是企业不变的匠心以及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体现了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的信赖，也传递出老字号产品赢得市场青睐的底层逻辑：始终坚持品质至上、诚信经营，终将绽放新魅力，彰显历久弥香的价值。(华峰 漫画/文)

他山之石

让低空物流触手可及

12月15日《经济日报》温济聪

背景：低空经济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预计今年市场规模将达1.5万亿元，2030年有望突破2万亿元。低空物流作为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利用无人机等航空器，在低空范围内进行物流配送的新型物流方式。因其立体运输特性，可突破传统物流依赖地面交通网络的局限，具有快速高效的优点，能够逐步拓展即时送达的边界，将遥不可及变为触手可及，正成为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点摘要：强化基础设施与网络布局。基础设施是低空物流发展的前提保障。无人机安全有序运行离不开地面设施设备的支撑，要加速推动无人机起降场地、通用机场、低空飞行器充电站和维修站等地面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发展基础设施网、通信导航网、空中航路网、低空服务网等多网融合的低空智能网联建设，为低空安全飞行保驾护航。

推动规模化应用与关键环节的技术突破，有效降低低空物流成本。低空物流运营的关键在于规模化，规模化的前提是标准化。推动物流企业、地方政府、低空飞行器生产商、金融机构等多方强强联合，实现技术研发标准化、低空运营高效化、飞行路径优化，提升运营效率；通过技术创新，推进无人动力系统轻量化、模块化设计，不断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推动一体化商业模式创新。应落实落细《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相关部署，积极探索制造、运营一体化，形成“研发+制造+运营”闭环。以场景拓展推动技术迭代升级、成本逐步降低，有效探索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

诚信网购不容恶意“蹭穿”

12月12日 人民网 魏晓敏

背景：随着“7天无理由退换货”等规则的普及，消费者退换网购商品更便捷，但也有少数人钻空子，或是将新衣当作旅行拍照的“一次性道具”，或在重要场合穿着后立即退货，甚至将穿过数日的衣服原样寄回。为防范“蹭穿”后退货，一些商家将衣物吊牌尺寸做大、设计更夸张，有的还在衣服关键部位加装密码锁等。

观点摘要：“蹭穿”不仅违背了诚信原则，更增加了商家经营成本，一些季节性衣服因此过季滞销。有鉴于此，花式吊牌成为商家对抗不诚信行为的无奈之举。但这带来了新问题。对普通消费者而言，这些防护措施影响了购物体验——试穿时被吊牌遮挡视线，拆卸时又担心损坏。持续增加的“防蹭”成本还会通过涨价的方式转嫁给所有消费者，形成恶性循环，损害市场健康发展。

遏制恶意退货，不能仅靠商家“自力救济”，还要对失信者进行约束。电商平台可建立更加精准的信用评价体系，让信用记录良好的用户享受更便捷服务，同时对异常退货行为加强管理，通过法律等途径对恶意退货者进行惩戒。(华峰 辑录)

刘宣轩

孟子以意逆志说作为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历来受到学界重视，其真实内涵，对文本、读者、作者三者关系的界定，自古以来争论不断。主流观点认为其中之“意”为读者之意，“以意逆志”即以读者之意逆推作者之志，持该观点的代表者为汉代赵岐(？—201年，京兆长陵人)：“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矣。”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意”应为作者之意，分析其志不应脱离作者自身情况。但在后世实际应用中，两派观点常陷入“读者主观臆断”与“作者历史背景考据”的两极。

而清初吴淇的阐释，提供了一个被学界长期忽视的、极具创造性的“中间路径”。他在读者一己之见和“古人之志”之间，重新发现了“古人之意”这一要点。而“意”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古人之意无疑来源于作品文本本身，“就诗论诗”，则是文章阐释中对文本本身的回归。

作品文本作为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之一，特别突出对其重视的研究流派无疑是西方文论中的新批评：提倡文本细读与“文本中心主义”。当然，吴淇“以意逆志”的最终目的依然是回归作者之志，这和新批评完全孤立分析文本的主张自然背道而驰，但在批评实践的方法论上，吴淇的理论对文本细读却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来看待二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吴淇从作者之志理解作者之志的真正内涵，并能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吴淇理论之于中国文论的创新性与重要意义。

一、吴淇“以意逆志”说的概念界定：意之舆与志之归

吴淇对“以意逆志”的阐释，站在了赵岐“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认为应以读者理解与感悟来探寻和阐释作者在作品中所寄寓的情感内核这一观点的对立面，但其并非走向了单纯以作者之志这一完全注重外部研究的道路上，而是提出要以“古人之意”以探求“古人之志”，“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

吴淇对意和志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刻的论述。首先需要先明确“志”的定义，在现代通常我们认为志为志向，是一个人对于未来的纯粹主观的理想追求，既可以是道德精神的追求，也可以是对物质丰富的向往。但吴淇在这里讲的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一般理解的面向未来之志向的单一维度，此志亦包含了史的维度：一方面，“志”是诗人个体的情感与抱负；另一方面，它更是时代精神、社会伦理与文化传统在诗人身上的凝结。因此，追寻此“志”，就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追求，更是一种基于历史客观性的探求，这也是吴淇所主张追求的。吴淇强调“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正是要求阐释者必须将诗歌放回其产生的历史场域，通过文本这一客观中介，去复原那种为特定时代所塑造、并可透过公共理性加以理解和检验的“心事情理”。

接下来需明确“意”和“志”的联系。“意”是“志”的审美化显现，诗人的根本之“志”，或情感情思，或政治理想，或哲学思考，无法在诗中直接地、生硬地以口号的形式喊出来，必须通过艺术创作，转化为一首诗独特的情韵、意趣、风格和氛围，即“意”。这个“意”，是“志”经过个人才情与艺术手法“发酵”后的产物。比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的儒家政治理想抱负，忠君爱国忧民之“志”，在《春望》中，就通过精巧的意象，精工的对仗具象化转化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沉郁顿挫之“意”；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又转化为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淋漓酣畅之“意”。而正因为“意”是感性、个性化的，所以即使主题相近，诗“志”类似，不同诗人的“意”也截然不同。同写友情之“志”，李白言“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有豪情激励之意；杜甫则言“故凭锦水将双鲤，好过瞿塘滟滪堆”更具郑重缠绵之意。以诗歌之意逆推揣测诗人之志，是以“以意逆志”。

明白志要通过意来表达后，应该同样明确的是意的生成

理论经纬

在作者与文本之间

——吴淇“以意逆志”说与新批评“文本细读”的跨时空对话(上)

离不开文本的细致雕琢。古人之意，自然要从文本文辞之中去探寻发现。“意”形式且只能通过修辞、意象等结构形式元素来构建和感知。形式元素是古人之“意”的建材，比如比兴、用典、各种意象，乃至声律、章法等，是构建一首诗“意”的材料和工具。而“意”则是形式元素整合后所自然产生的审美效应，在读者心中激发出的整体性的、可感的氛围、情调和趣味。例如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使用了一连串的印象，但诗的“意”，那种清冷、孤寂、羁旅劳顿的况味，并非来自任何一个单一意象，而是来自这些意象的蒙太奇式组合所创造出的整体意境。这就是读者在阅读实践中所能感知到的“意”的内涵。因此，批评家的任务，正是通过精细地分析这些作为诗歌“建材”的形式元素如何被诗人组织、搭配，来准确地把握和描述那座“建筑”，即诗人之意的整体风格与神韵。因此，我们可以说吴淇的“以意逆志”强调的是对文本的使用，以批评者思想与诗义互证为首。这就将文本分析牢牢地确立为阐释的基石。换句话说，要理解古人之意，离不开对文本形式结构的深刻分析与体认。

总的来说，吴淇主张的“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是就诗之文与意以论诗之志。首先，“文辞”是客观存在于文本中的物质材料，文辞对意来说是一客观材料，读者通过对文辞所构建的意象、声律、结构的综合体验，形成对“意”的整体把握；意在读者完成了对文辞所表达出来的意象意境的综合体验后成为意，这个“意”一旦被文本所规定和显现，便不再是读者的私意，而成为了可供公共探讨的“古人之志”，此时的意对志来说又是一客观材料，用以承载无形之志，通过意来推导作者之志，此推导过程亦是要求保证客观，必须遵循文本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语境，使无形的古人之志变得有形。在此基础上，我们谈论诗、谈论美、谈论道、谈论德，就不再是空谈无物，而是有了一个含有批评性的共识与标准。

二、与新批评的深层关联

吴淇言：“诗有内者外，显于外者曰文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前文已经论证，志与意的探索恰恰离不开显于外者的文辞与外在形式结构，这种研究方法论与上世纪二年代代开始兴起的新批评流派许多核心观点不谋而合。其认为由于意图谬误与感受谬误的存在，作者和读者都不可靠，那么批评的唯一可靠对象就是文本本身。他们倡导“细读法”，即对文本的词语、句法、修辞、意象、象征、语调、节奏等内在元素进行极其精细的分析，以揭示其复杂的内在结构和多重含义。这种对待文本的态度和吴淇“就诗论诗”之论是高度相似的。

(一)共识：一己之见的谬误

吴淇将“以意逆志”之“意”，加入了古人之意这一要点，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完全脱离具体人物、文本内容、事件场景而完全凭借自身经验和臆想进行的解读。其言：“诗人，古人阅历之实境。苟非亲历其事，履其地，目睹其景物，而任耳臆，只是猜谜，不谓解诗。”又严厉批判“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反对以“己意”说诗。

与之相似的是，新批评同样对读者的主观臆断在理论上提出了明确反对，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感受谬误”，指根据读者感受到的个人情感反应来评判作品是一种谬误，因为这会导致印象式和相对主义的批评，其认为以读者情感作为

评判标准是批评的歧途。

由是观之，在批评实践中，双方都要一种客观化的、受约束的阐释学，都将读者随意的主观性视为大敌。

(二)同一：“文本细读”的方法论

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阐释、理解应当是受到约束的，不能任由主观情绪左右，而约束来源应该向何处寻找呢，这就是吴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的突破与高明之处，其没有同考据学者一般陷入对作者本身创作背景、思想观点、品质道德等无穷尽的考据之中，而是抓住关键矛盾——文本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更具体来讲，吴淇找到的约束是“古人之意”，即内在于诗歌文本的语言、修辞、结构等一切要素。他要求阐释者“载志而游”时，必须沿着“意”这条路径，不能跑偏。而新批评找到的约束同样是“文本本身”，要求批评家紧紧贴着语言的肌理、意象的编织、结构的安排来进行分析。殊途同归，二者在方法论上依旧具有同一性。

吴淇的“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在操作层面上，必然要求对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深入的揣摩和分析。他编选《六朝选诗定论》本身就是—个大量的文本细读实践，其名为“定论”，追求的便是释义的权威性效果，而这权威性的来源，便依赖于其所分析的内容都紧贴文本，断无虚言。要把握“古人之意”，必须对诗歌的字法、句法、典故、意象、声律、章法进行极其精细的揣摩和分析。如此便可从“意”的方寸之间，逆推出“志”的宏大世界。这与新批评倡导的“细读法”在形式上高度一致——都是对文本细节的极度关注和严密分析。在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中有大量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作品之“意”，作者之“志”的案例，在此举出一例：

《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在品评《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时，吴淇先论整体结构：“‘回车’‘长道’，是纵述之茫茫；‘东风’‘百草’，是物色之茫茫。……‘所遇’二句，承上启下。‘故物’是‘东风’‘百草’之故物。”他指出“茫茫”二字既写“长道”之空间渺茫，亦写“百草”之物色纷纭，将外部景象与内心迷惘融为一体。他对“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的承启功能分析，精准地揭示了诗句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正是“文本细读”的典型操作，旨在厘清文本内在的肌理，从而客观地把握诗歌如何一步步构建起其“苍茫感伤”之意。

而后再论关键意象与用字之妙：“宋玉《九辩》‘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摇落’二字衰飒。此曰‘东风摇百草’，‘摇’字忽妙。……盖‘摇落’者，秋气之悲，‘摇’而生者，春气之感。同一‘摇’也，而衰旺迥异，要皆乘时而有感衰。”这是吴淇文本分析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他聚焦于一个“摇”字，通过与前代经典文本的精细对比，揭示出同一词汇在不同语境中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美学效果。他指出，宋玉的“摇落”是衰杀，而本诗的“摇”是在东风中生长，本是生机勃勃之象。然而，诗人却从这“生”中看出了“衰”的必然规律。这种分析，远超寻常

的训诂，而是进入了诗歌语言的张力与反讽层面。他通过剖析这个关键的“文辞”，深刻地揭示了诗歌“意”的核心——在一片繁盛的春景中，感悟到盛极必衰、生命无常的深沉悲感。这完美地证明了吴淇的“细读”足以与后世新批评对“诗歌的悖论语句”、“反讽”等分析相媲美。

最后，分析自然要完成向诗人之“志”的逆推：“‘盛衰各有时’，是穹开语；‘立身苦不早’，是呼应语。……盖‘盛衰’者，物之盛衰；‘立身’者，我之盛衰。……至‘人生’以下，层层追紧，逼出‘荣名’二字，乃是此诗之志也。”吴淇将“盛衰各有时”与“立身苦不早”解析为“物我”的对照，指出诗人的感伤并非止于外物，而是落脚于自身。最后，他通过对诗歌逻辑递进的分析，极具说服力地得出结论：全诗最终逼出的“荣名以为宝”，正是此诗之“志”。这个“志”，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诗人面对宇宙时空的无穷与生命有限的残酷现实后，所确立的一种积极的价值选择和精神寄托：将建立不朽的声名作为超越生命短暂性的途径。这正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的体现。

上述论证，始于“文”，成于“志”，终于“志”，有力地证明了吴淇的“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绝非空谈，而是一套体系严密、操作性极强的批评实践。他确实是在作者之志与读者之意的原有结构中，成功地置入了“文本”这一客观、可分析的中间环节，使其理论既超越了主观臆断，又不同于纯粹的历史考据。

事实上，这种阐述诗歌的方式是极其具有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的，例如我们用“就诗论诗”，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陶渊明《饮酒·其五》，并以“以意为舆，载志而游”：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首先是字法层面的分析，“而无车马”的“无”字，是一种主动的隔绝和否定，是“缺席”的美，并非指客观物理上的寂静，而是心境的选择。“心远地自偏”的“远”字，是诗眼，点明了这种隔绝的内在性和精神性。

而后是句法层面分析，开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立刻在“世俗”与“超脱”之间建立起张力。“张力”正是新批评所创设的概念，指诗歌中各种对立冲突所构成的平衡状态，是诗歌力量的来源。

接着我们对意象与场景进行分析：“采菊”、“见南山”：动作是“悠然”的，是不经意的、无目的的。菊花是高洁的象征，南山是永恒的象征。这两个意象的组合，便营造出一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瞬间。

从诗歌整体结构入手分析，全诗从“心远”的哲理阐述开始，到“采菊”的具象画面，再到“飞鸟还”的自然观察，最后收束于“忘言”的玄妙体验。这是一个从理性到感性，再到超理性的螺旋上升结构。

最后，诗歌依赖上述所有构建，非常自然地完成了整体之“意”的生成，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首诗整体流淌着一种“冲淡平和、悠然自得、与自然契合”的意趣和情韵。这种“意”是舒缓的、静谧的，充满了内在的满足感。这时我们便可以从此股“古人之意”进而追问：这种“冲淡平和”之“意”，承载着诗人怎样的“志”？在笔者的理解下，这并非一种简单的闲适和自由。结合“心远”的主动选择和“忘言”的生动体验，诗人所寄托的“志”，是一种疏离污浊、安于贫贱，在自然与朴素生活中寻求生命真谛和人格独立的高洁志趣。这种“志”具有明确的道家思想的哲学内涵和中国处士群体的价值选择。文本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这一根本之“志”提供最具体的注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吴淇对“以意逆志”阐释和新批评的深层关系，尽管分析的术语不同，目的不同，但双方都坚信，意义的奥秘，深藏在文本肌理的每一个细节之中，都必须通过“显微”式的阅读来获取。(待续)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